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探索与启示

许门友¹,许旻²

(1.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2. 西安体育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为了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从社会历史动因和哲学工作者的实践探索出发分析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具体情形。分析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离不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推动和实践探索;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学习和借鉴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积极探索新形式、新方法、新途径,即哲学社会工作者应该“民众化”、宣传内容现实化与生语化、宣传语言通俗化与大众化、宣传方法多样化。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哲学工作者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106-07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受苏联哲学家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深刻影响,以艾思奇为代表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他们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利用通俗化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指导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

任何一件事情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历史

条件和背景,或者说社会动因,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绝不是偶然的事件,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

(一)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矛盾日益尖锐,中国的民族灾难进一步加深。同时,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断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不仅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还要争取广大民众对革命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唤起民众,用先进的革命理论武装他们。但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还存在着轻视理论的倾向,刘少奇对此曾经有过深入的分析,他

收稿日期:2015-12-16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ZD01)

作者简介:许门友(1964-),男,陕西山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说,有些人“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1]。理论准备的不足给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大革命的失败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正如革命活动家、教育家冯乃超所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们认为,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弱点,主要是缺乏理论指导。因此觉得,很有赶紧向中国的读者——知识阶级,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展开宣传工作的必要。”^[2]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理论武装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领导,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兴起。

(二) 对国民党唯心主义哲学的有力回应

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是,国民党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从内部来讲,各个派系之间的争斗并未结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依旧困苦不堪,而外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深。为了维护一党专制,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行围剿的同时,在文化上加强对广大人民的控制。从1927年开始,国民党开展了为期10年的“党治文化建设”运动。其主要措施,一是进行所谓的“党化教育”。“党化教育”在起初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如要求教育要贯彻反帝、反封建的方针,但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以后则日益走向反动。1932年,国民党在赣、闽、皖、鄂等省开展的所谓“特种教育”,大肆推行反共宣传,更是直接暴露其推行所谓“党化教育”的真正目的,这就是消除革命影响,麻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二是提倡尊孔读经。为了消解人民的革命斗志,国民党极力宣传儒家学说和思想。1934年,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尊孔祀圣”的决定。此时,蒋介石还发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封建的“三纲五常”,要求人民群众忠于国民党统治。

为了使党治文化具有理论色彩,国民党右翼势力还极力鼓吹其唯心主义哲学,如戴季陶的“民生哲学”,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

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鼓吹“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求生存的……记录,是唯生而不是唯物的”,企图直接从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歪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达到“以理论打击共产党”的目的;蒋介石宣扬所谓的“力行哲学”,以重塑国魂为幌子,打着革命与科学的旗号,宣扬看似是“知难行易”,实则是“大学之道”的一套封建教化,对人民群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等等。为了使国民党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被更多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国民党文人和政客有的出版论著、有的发表演讲、有的利用报刊进行造势,并且在普及化、通俗化上大做文章。尤其是这一时期的一些刊物,在推动国民党唯心主义哲学宣传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1936年上海市教育局创刊的《读书青年》杂志,读者对象为中等学校学生和一般青年,其很多栏目都采用讲话体,如“读书讲话”“中国文化讲话”“作文讲话”“国际问题讲话”“自然科学讲话”等,极具通俗性。该刊为了给蒋介石歌功颂德,先后发表了国民党“CC”系主要骨干潘公展的《非常时期青年应有之觉悟》《中国不亡论》《蒋委员长革命事迹》以及顾森千的《蒋委员长的青年时代》等文章。因此,为了阻止和对抗国民党的文化钳制,抵制其唯心主义哲学大众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

(三)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深刻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火如荼,共产主义实践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苏联理论界积极开展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期间曾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哲学论战,一次是德波林学派的辩证论反对机械论的论战,另一次是米丁等红色教授学院学者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这两次哲学论战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教科书体系,也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相结合的宣传方向,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哲学界对辩证法的研究。与此同时,以布哈林、郭列夫等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3]的布哈林,在这方面贡献较为显著,他的许多

著作都具有很强的通俗性,其哲学代表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他在该书《自序》中说:“本书是按照《共产主义ABC》一书的样式来写的”,“力求写得通俗”^[4]。该书从医学上的精神分类讲到天文学,地质学和动、植物学的发展,从古代的中国礼仪讲到现代新的绘画流派,旁征博引、文笔流畅、举例生动、引人入胜。这种通俗化的写法使得工人、农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郭列夫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一书,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详尽地阐述了哲学的基本定义、近代唯物论的发展、辩证唯物论与科学的关系、唯物史观及其国家观、宗教观、道德观、艺术观以及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等。苏联哲学家对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就是参考了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写成的,该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在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艾思奇《大众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写法更是深受苏联哲学家的影响。

二、哲学工作者的实践探索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开展起来的。早在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了“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并且要普遍这种宣传到工人群众中去”的要求^[5]。1930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下简称社联),以开展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精心组织有力地保证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蓬勃开展。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艾思奇、陈唯实、胡绳、沈志远等则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精英具有坚定的理想和革命信念,他们不仅自身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勇于担当、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工作。为了民族的事业、为了激发人民的革命意志,他们不愿一味地呆在书斋里

从事高深的“学问”,而是放下身段,走向民众,用实际行动向人民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曾经直言:“《大众哲学》实在花费了我不少的精力。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罢。”^[6]正是哲学工作者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促使他们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并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之源和事业之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只有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走进革命导师的内心世界,与伟人“对话”和“交心”,才能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领悟其思想精髓,不断汲取理论创新的精神动力和丰富营养。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零星地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哲学的贫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翻译出版,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以往。从数量上看,大致是1930年5部、1932年6部、1934年2部、1936年1部、1937年1部。除了上述著作以外,这时翻译出版的还有《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等。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翻译出版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反映了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需求;二是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不仅有摘译本,而且大量的是全译本,《费尔巴哈论》《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资本论》甚至还出现了多个译本,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质的飞跃,即从简单的介绍到更高层次的学习研究。

第二,哲学内容宣传紧密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哲学如果不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双向互动,就很难摆脱玄奥、抽象、枯燥、脱离实际的命运,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哲学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要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实践,并为其提

供方法论指导。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7]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状况,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而世界密布着战争的阴云。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前途,怎样认识世界形势,怎样解开人民群众的思想迷雾,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峻挑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停留于书本上的理论探讨,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通过通俗化、大众化的途径和方式方法,解答人民群众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民众,影响民众,扎根于民众。譬如,艾思奇在《大众哲学》里就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经济凋敝、军阀混战、日本侵略等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分析,他从哲学的高度来阐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思想,指出什么样的抗战思想是正确的,什么样的抗战思想是错误的,从哲学理论上论证了真理在中华民族这一边,而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一边;真理是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这一边,而不是在法西斯那一边,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正是由于广大哲学工作者设身处地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和利益出发,把哲学变成大众的哲学,讲述大众自己的故事,以大众自己的喜怒哀乐作为原料来宣传哲学,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达方式力求通俗化。语言的通俗化或者大众化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风问题,好的文风是群众接受、理解、运用理论的催化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学说,在语言表达上较为晦涩难懂,这就使得以工农为主体的中下等文化水平的群众难以理解和掌握,从而严重妨碍了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和影响。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内容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使一般人都能听懂、看懂、理解、接受是很有必要的。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克服了许多哲学家“言必称希腊”,纯粹用所谓的学术语言和高深莫测的概念来研究、宣传哲学的通病,从而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群众也能理解和掌握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艾思奇在写《大众哲学》时,“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他在《大众哲学》中采用讲故事的方法来阐述各种不同的世界观,破除了哲学的艰深玄妙,因此毛泽东称其为“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是有价值的”著作^[8]。胡绳也非常注意用人们所熟悉的语言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看来,耳熟能详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必备前提之一,其“书信体”的表达方式就深受群众欢迎。陈唯实认为,文字的通俗易懂是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大众化就是把文字写得浅白易懂,使讲话或文字的形式通俗化。正是由于当时哲学工作者的努力,才破除了哲学的神秘,使它变得通俗易懂,从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挥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形式趋向多样化。任何一种理论的传播,都离不开一定的形式和载体。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采用好的形式和手段使人民群众接受,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曾经提出:“为适应目前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兴趣,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组织与刊物。……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信社,社会科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5] 可见,当时党中央已经意识到多样化的理论宣传形式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中,不仅采用课堂讲授这一传统方式,而且也在积极发挥其他宣传形式,如广播、报纸、杂志、电影等媒体的作用,尽管这些媒体在当时还是较为新式的传播方式,但其作为大众传媒的巨大优势已经展现出来了。其中,利用大众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时的普遍形式,如《大众哲学》就是先在《读书生活》杂志上陆续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的。胡绳的《哲学漫谈》也是首先在《新知识》和《新学识》杂志上连续发表,其后才结集出版的。

三、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意识形态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负面价值观有所滋长,信仰缺失、精神迷惘、道德滑坡等现象凸显,一些社会成员包括少数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信念动摇。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中国梦过程中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指导和引领作用。那么,当前应该怎样有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启示。

(一) 哲学社会工作者应该“民众化”

哲学社会科学要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就必须走向大众,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科学知识,这也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20世纪30年代,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哲学工作者勇敢地承担起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神圣使命,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党的长期培养,其中绝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信仰,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就是存在着纯学术化的研究误区。当然,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应该从学术上开展深入研究,但这种研究绝不是远离社会生活、远离大众视野,一味地热衷于经院式的考证和思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纯学术的东西,局限于狭小的圈子里,实际上是要把它和人民大众分割开来,这将会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作用的发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肩负起社会的责任,放下身段,走出书斋,走向民众,用实际行动向人民大众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真正化为人民群众的“学养”。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内容必须现实化、生活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在实践中诞生的,

它只有关注现实、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深入分析和回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使人民大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功能和作用才能得到发挥。在党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取得实效的时期,都是其宣传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做的比较好的时期。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总体小康目标的实现,中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但是,我们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治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一方面需要通过强化社会建设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做出解答,以破除人们的种种思想迷雾。因此,我们要紧密联系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以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语言要通俗化、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文风问题,主张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写了《反对党八股》一文,提倡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表达,他说:“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9]毛泽东的理论文章,叙事明了,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如,他曾经批评教

条主义者说,教条主义者连猪都不如,猪碰到墙上还知道痛、知道转弯,而教条主义者碰到墙上就不知道痛、不知道转弯。这就形象地刻画出教条主义者那种顽固、呆板的嘴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如今,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有了较大提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语言表达上也已经相当通俗化了,群众“懂”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什么主要问题了,但在宣传上仍然要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只有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当前理论的宣传上,形式僵化呆板、空话套话太多、语言枯燥乏味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哲学研究领域甚至存在着“问题越来越高雅,视阈越来越狭窄,字眼越来越生僻,概念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晦涩,逻辑越来越玄妙,文章越来越难懂”的怪现象^[10]。一些论著文风晦涩,咬文嚼字,引进甚至制造生僻概念;有的学者热衷于抽象和思辨,习惯于用一些大家看不懂的话语来表达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把有意义的问题表述得没有意义,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加以克服。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法要多样化

理论宣传的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拘泥于一种或几种方法^[11-16]。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方法上并不局限于课堂讲授这一种,报纸、刊物、广播等媒体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17-18]。在当代,尽管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经过上百年的传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怎样使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热情和兴趣,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依然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多种传播手段,创新传播途径。第一,要改进传统的灌输方法。灌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一种传统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修养和政治觉悟,灌输仍然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方法。但是,实践证明,过去那种填鸭

式、命令式、教条式的机械灌输方法已经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因为它过于突出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将受教育者置于被动服从的位置,因而难以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灌输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内容的科学性,也要注重灌输方式的多样性,如:可以采用教学互动、参观考察、专题讲座、先进事迹报告会、图片展览、读书演讲、知识竞赛等,寓教于乐、寓教于学,这样的理论灌输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第二,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现如今,广播、电视、报纸等这些覆盖面较为广泛的传统媒体,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一些媒体工作者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譬如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以及一些电视政论片等,把先进的创新理论和电视传播手段相结合,实现了理论讲解和受众的无缝对接,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第三,重视和采用新媒体。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广泛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和人类的交往方式,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拓展了新的空间和渠道。如互联网技术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广泛性、便捷性等特点,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阵地和新领域,如果运用得好,将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之,只有以受众为主体,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亲和力和感召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自然会水到渠成,显现成效。

四、结语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这个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推动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而以艾思奇、胡绳、陈唯实等为代表的广大哲学工作者则发挥了先锋和主力军的作用,正是他们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工作,才使得哲学大众化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

- 社,1981.
- [2] 冯乃超,蒋锡金.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J].新文学史料,1986(3):19-35,68.
- [3]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M].李光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 [6] 艾思奇.大众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8]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陈曙光.谈谈“理论”与“问题”[J].湖湘论坛,2008(4):83-85.
- [11] 齐艳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
- [12] 王学俭,刘强.新媒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取向[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01):146-149.
- [13] 赵付科,李永健.微博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探析[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04):74-78.
- [14] 魏泳安,王学俭.新形势下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媒介路径探究[J].理论导刊,2012(05):47-50.
- [15] 刘强.基于新媒体技术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2.
- [16] 卜叶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政治工作路径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4.
- [17] 郭德钦.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 [18] 焦金波.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1930s

XU Men-you¹, XU Ya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China;

2.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Xi'an 710068,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knowing and changing the objective world i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realiz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and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popularization movement in 1930s from its social historic causes and philosophy researchers' practical explo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cannot do withou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 Marxist philosophy-workers' positive promo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 should learn the experiences in 1930s, and positively explore new forms, new methods, and new paths, which refers to that philosophy-workers should make the propaganda content more realistic and propaganda language more popularized and propaganda methods more diversified.

Key words: 1930s; Marxist philosophy; popularization; philosophy-worker